

救亡与复兴

——抗战时期的民族觉醒

游国斌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引言.....	(员)
一、民族与民族觉醒.....	(员)
二、近代民族觉醒的历程.....	(源)
三、时代主潮：救亡与复兴.....	(愿)

上篇 救亡图存的意识取向

第一章 在国难中觉醒.....	(员)
一、危机与忧患：“天朝上国”殿堂的坍塌	(员)
二、情感与理智：近代民族意识的滋生.....	(愿)
三、自审与超越：救亡图存途径的寻求.....	(源)
第二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愿)
一、妥协与抵抗：两种迥异的政策.....	(愿)
二、屈辱与激愤：民族情感的炽燃.....	(源)
三、发展与升华：救亡高潮的兴起.....	(愿)

第三章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页码)
一、	“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页码)
二、	国共合作，民心所向	(页码)
三、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页码)
四、	卖国巨奸，千夫所指	(页码)
第四章	空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页码)
一、	中国军队的抗敌意志	(页码)
二、	各界民众的报国情怀	(页码)
三、	少数民族的一致奋起	(页码)
四、	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	(页码)
第五章	竖起民族的脊梁	(页码)
一、	持久抗战，志在必胜	(页码)
二、	英勇坚贞，舍身报国	(页码)
三、	崇尚气节，临难不屈	(页码)
四、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	(页码)

下篇 复兴中国的心理追求

第六章	追求复兴的心路历程	(页码)
一、	从“师夷长技”到“自强”、“求富”	(页码)
二、	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	(页码)
三、	从“振兴中华”到“改造中国”	(页码)
四、	从“西化”到“现代化”	(页码)
第七章	工业化的探索	(页码)
一、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	(页码)

二、对工业化道路的探讨.....	(猿愿)
三、工业内迁的“敦刻尔克”.....	(猿园)
四、战时工业化方策的推行.....	(猿愿)
第八章 民主政治的谋求.....	(猿愿)
一、民主宪政还是专制独裁.....	(猿愿)
二、政治民主化的新契机.....	(猿愿)
三、理想与现实：民主宪政的呐喊.....	(猿园)
四、“联合政府”：民主化进程的新目标.....	(猿园)
第九章 复兴文化的思潮.....	(猿愿)
一、全盘西化还是中国本位.....	(猿愿)
二、文化复兴思潮的发展.....	(猿园)
三、返本开新：新儒家的文化设计.....	(猿园)
四、文化内迁：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	(猿缘)
第十章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构想.....	(猿园)
一、从国情出发的历史选择.....	(猿园)
二、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方向.....	(猿园)
三、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猿愿)
结语.....	(猿园)
主要参考书目.....	(猿园)
后记.....	(猿园)



引 言



一、民族与民族觉醒

在展开本书的阐述之前，我们首先就遇到了“民族”和“民族觉醒”这些最基本的概念问题，如果对这些概念不能做出比较明确的把握，我们的研究就缺乏必要的出发点。

“民族”一词的英文为 *Nation* 源于拉丁语 *Natio* 意为“诞生物”，原是指诞生于同一地方的一群人，由实际的或想象的具有同一血统和共同语言者所组成的社会集团。17世纪后，西方用“民族”（*Nation*）指主权国家的人民，而不问其种族和语言是否一致。实际上，它是对一国之民的统称，与18世纪出现的“国民”（*Citizen*）一词意义相近。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大陆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也常以“民族”这一概念来指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民族”又成为“国家”（*Nation*）的同义词。此外，西欧学者还往往把“民族”一词用于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因为西欧诸国原先大都是在近代形成的民族成分比较单一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和“国家”可以相通。

在我国，最早使用汉语“民族”一词的是王韬，他于1851年所著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称：“我中国……幅员辽阔，民族殷繁”。^① 1875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也使用了“民族”一词，诸如“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民族竞争”等。此后，梁启超不仅大量使用“民族”一词，还写了许多专门论述民族的文章。到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后，“民族”一词便在我国普遍使用了。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也开始出现。孙中山在其早期革命生涯中先后提出的“恢复中华”、“振兴中华”等口号，就含有复兴中华民族之意。辛亥革命后，他进而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是曰民族之统一”。^② 这就是当时流行的所谓“五族共和”，从而表露了把中华诸民族统一于“中华”的思想，也即“合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中华民族”的思想。但孙中山后来又否定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因为他看到“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③

尽管历史上“民族”一词颇多歧义，但在今天，通行的

^① 转引自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1985年印，第144页。

^② 孙中山：《中华民族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③ 转引自张磊：《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7页。

解释是：第一，“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第二，“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①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是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传统文化和心理素质为特征的，如中华民族、印度民族、英格兰民族、美利坚民族、俄罗斯民族等。

在我国，“民族”一词虽然阅世不久，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却早已生息繁衍于神州大地，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自我体认也是源远流长。费孝通指出，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是，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②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在斗争中逐渐认清中华民族整体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共同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认同内聚的合力，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自觉大联合。也正是这一斗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觉醒”一词，系相对于“酣睡”、“酣梦”而言。“觉”与“醒”两个词素组成同义合成词。“觉”即指省悟、知觉，也有睡醒、醒悟之意。“醒”义与“觉”相近，即指梦觉、醒悟等意。对于个体，谓之“觉醒”，既有自然描述之义，

^①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95 页。

^②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 页。

也不排除引申之义，而对一个民族称“觉醒”，则只有引申意义可言了。18世纪初，拿破仑曾把中国比作“睡狮”，警告谁也不要将它惊醒。因为它一旦惊醒，世界将为之震撼！19世纪 80年代，清末外交家曾纪泽在伦敦《亚洲评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睡与醒》的文章，称中国人暂时沉睡，往后会醒过来。也就是所谓“先睡后醒论”。

尽管拿破仑的“睡狮”论和曾纪泽的“先睡后醒论”被传诵一时，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但他们都没有阐明民族“觉醒”的内涵。作者认为，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既是指近代中国人逐渐摆脱自我封闭、虚骄自傲的“天朝心态”，重新认识世界和自己的过程，又是指中华民族为追求独立、自由、富强、民主而产生的心理变迁与观念更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无数中华儿女以赤子报国之心，百折不挠，上下求索，迸发了一朵朵光彩照人的思想火花，创造了一份份可歌可泣的历史业绩，同时，也留下了一张张未完的历史答卷与诸多遗憾。

二、近代民族觉醒的历程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对中国接连不断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逐渐丧失了民族独立。由此引发的民族危机，唤起了民族的觉醒。近代民族觉醒的历程既与民族危机深化的程度相随相伴，又与民族主义思潮的涨落紧密相连。而每一次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都凝聚着亿万中国人震天撼地的呼号呐喊，记载着民族觉醒的历史轨迹。

中华民族近代民族觉醒的历程，主要表现为对救亡图存途径的不断寻求和对民族复兴道路的不懈探索上。近代以来一次次的民族危机，迫使先进的中国人临危思变，探寻救亡与复兴之路。因此，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一是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的独立；一是追求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救亡图存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惟有实现独立，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也只有在民族复兴的基础上，才能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历史命运。基于这种认识，无数志士仁人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和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他们为实现这些方案和理想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相互交替，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发展趋势。

然而，近代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因素又决定了民族觉醒的历程异常艰难。为达救亡图存的目标，近代的志士仁人竭尽全力弘扬民族传统，激发国人的民族感情，以求在外来侵略面前保持中华民族的强韧抵抗力。而为达民族复兴的目标，近代志士仁人又必须竭尽全力学习西方国家的文明成就。前者通常情绪化地要求崇古排外和怀旧保守，后者则通常理智化地要求薄古重洋和改革创新。前者通常要求强化民族本位，阐扬民族自我意识，后者则通常倾向于淡化传统，强调西化。这样，救亡与复兴的双重历史使命势必使近代志士仁人面临两难的选择：为救亡图存，就得低首下心地“师夷”，为民族复兴，又得忍痛改变旧有社会机制；为“保种”，就得“保教”，为“西化”，又不得不摒弃传统。近代志士仁人渴望现代化，却又难以解脱传统的情结。于是他们

常常陷入一种矛盾困惑之中，在古与今、新与旧、中与外之间徘徊踟蹰，难取难舍。

近代民族觉醒的历程是一个曲折和漫长的历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历程。在此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民族觉醒的状态与程度是不一样的。大体上说，鸦片战争后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虽然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意识不断增强，直接遭受列强侵略的地区的人们更是前仆后继英勇抗争，但就全国大多数人来说，并未切身感受到民族危机；虽然少数仁人志士在历史剧变的刺激下极力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传统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观念在较大程度上仍妨碍着“师夷”和“制夷”的成效。至于掌握着全国政治资源的统治者，虽然在列强的步步紧逼下也做出一些被动的反应，采取了一些抵御侵略的措施，做出了现代化的种种尝试，但最终总归于失败。这样，我国虽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先后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未能从根本上阻止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这些都表明，这一时期的民族凝聚力始终未真正强固起来，民族觉醒的历程举步维艰。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对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道路开始有了比较自觉和富有理性的认识。孙中山说：“中国之初醒，实在中日战役之后。”^① 梁启超也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②

①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51 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1 页。

甲午战争的结局，使中国人加深了各民族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首先在那些志士仁人中得到阐扬，并在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中采取一致行动。进入 20 世纪，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在不断掀起的爱国运动中，民族认同感得到进一步增强。思想界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了几次大的论争。这些论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程度更为广泛和深刻。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虽未能改变，但中华民族救亡与复兴的潮流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新趋势。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趋向。尽管民族的觉醒艰难曲折，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进取而逐步深化，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不断地往前迈进。这就像作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长江，虽百转千回，而其东向奔海的大趋势却始终不变。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结合对中国人民形成的双重压迫，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华民族的危机，同时也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和反抗，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①

^① 江泽民：《在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7 年 7 月 1 日。

三、时代大潮：救亡与复兴

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而言，抗日战争时期无疑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一方面，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劫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被大大地延误；另一方面，日本的野蛮入侵，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抵抗，促使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民族的空前觉醒，不仅增强了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意识，而且更加激发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和对民族复兴的渴望。

抗日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历次反侵略战争。它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代进行的。虽然中国的整体实力仍然较弱，但中国社会政治状况和民族觉醒程度，毕竟大不相同了。日本的全面入侵，民族的空前危机，唤起了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对国家民族强烈的归属感，近代以来救亡与复兴的双重使命从来没有如此痛切地摆到中国人面前，即使对政治淡漠的一般民众也都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郭沫若在 1935 年 10 月写的《救亡日报》复刊词中指出：“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① 这表明，抗战时期的民族觉醒具有空前的性质，救亡与复兴已成为时代的大潮。

^① 转引自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5 页。

民族的空前觉醒，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以救亡图存为主旨的爱国精神和独立意识上。爱国精神和独立意识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扎下了根，成为全民族的共同意识。这种全民族的独立意识通过一系列的具体行为和动向反映出来。

第一，中国各阶级、各派政治势力基于抵御外侮的共识，停止了纷争，由分裂走向合作，并最终结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外御其侮而停止国内战争，这是一种由共同的历史文化哺育出来的深沉的民族心理。中国共产党正是传承了这一历史文化，把挽救民族危亡视为自己的神圣天职，捐弃前嫌，率先调整了各项政策，于是有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系列主张和行动。作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原来是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在民族灾难和人民抗日的怒吼声中也改变自己的内外政策，逐渐站到了团结御侮的立场上来。尽管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仍存歧见，但在这种团结御侮、挽救危亡的共同意识的推动下，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国共两党的合作满足了全国人民共御外侮的心理要求，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推动了其他爱国党派间的团结合作。国内主要的爱国党派，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都先后表示拥护蒋介石联共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抗战为转机，过去长期分裂不和的国民党各派开始走向团结和统一。这样，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全民族

共御外侮的局面形成了。强敌的入侵，促使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战斗的整体。

第二，中国人民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同仇敌忾，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抗日事业，呈现出空前一致与广泛参与的特点。这也是中华民族觉醒、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的生动体现。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中国近代也有过多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但像抗日战争这样大规模的、全民族奋起的战争确实为前所未有的。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国情、自身优势和中日战争形势的清醒认识，找到了自己在民族独立战争中的最佳位置，做出了实行敌后抗战的决策。遵循这一决策，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挺进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了一块又一块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抗战中，共产党的意志与人民的力量融为一体，并以最广泛、深刻的民众动员，创造了极为有效的人民战争形式，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虽有其局限性，但也认识到“守土抗战之责任”，声称具有“牺牲一切之决心”，^①进行抗战的部署和人力、物力上的动员。一再迁都抗战，显示了其“抗战到底”的决心。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领导的军队顽强地抵抗日军的进攻，打破了其“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成员，他们的情况不同，选择的方式不同，但奋发敌忾的精神是一致的。不论是中国军队

^① 《革命文献》第 232 辑，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 1975 年版。

的广大官兵，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实业家，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海外侨胞，无不以各种方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广泛自觉的抗敌斗争。这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所感叹的“以北洋一隅之师抗击日本全国之师”的局面相比，有如天壤之别。“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显示出抗战时期的民族觉醒和奋起确实具有空前的性质。

第三，中国人民在残酷战争的现实面前，自尊自信，竖起了脊梁，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表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既源于中国悠久文化和爱国传统的熏陶、铸造，也来自新的时代、新的民族觉醒的赋予。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灭，正是因为有着百折不挠、坚忍不屈、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①这段话不仅是对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精神的一个总结，而且也表达了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打败敌寇的决心。在武汉群众举行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国民参政会最年长的参政员、年愈古稀的张一麐致词说：“七·七”是最光荣的一天，比起双十节来更加光荣。希望大家加强团结，抗战到底，永远竖起一条脊梁。主持纪念大会的郭沫若提出要把张一麐老人的这句话，作为民族典故写在自己的文章里。他们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525 页。

念，而且是一种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国获得独立解放的重要保证。

这种民族精神，从效命疆场的抗日将士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是模范的抗日军队。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而战，表现出威武不屈、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为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内容。就是国民党军队，出于保卫民族生存和独立的目的，面对优势装备的敌军，浴血奋战，同样表现出英勇顽强、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这种气概和精神，从战场之外的广大民众身上同样反映出来。在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宁死不屈，以身殉国；有多少人毁家纾难，捐资助战；有多少人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这种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向世人和后代昭示，中华民族伟大的凝聚力和独立意志是任何自命强大的侵略者所不能战胜的。

早在战争刚爆发时，多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朝日新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就说，日本“并非是对付支那统一政权国民政府，而是与整个支那民族为敌”。“国民党政府所拥有的武力，恐怕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问题，而与支那民族阵线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冲突，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① 战局的发展正被尾崎所言中。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所形成的强大的抗日力量正是侵略者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

^① 转引自刘学照：《抗日战争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4期。